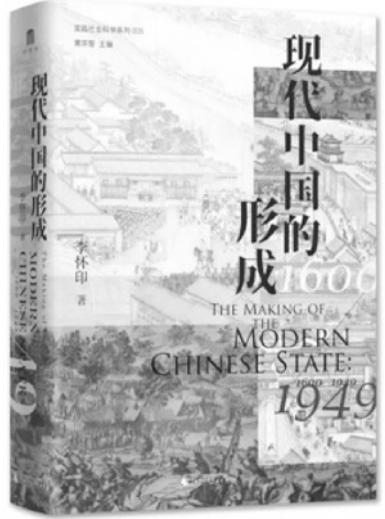


# 解读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新视角

郑 豪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词汇。常年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许宏，撰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溯源中国》，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以研究思想史闻名的葛兆光教授，同样有“中国”三部曲：《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主张“从周边看中国”，倡导回到历史语境，理解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族群与国家。

不同领域出身的学者都在关注“中国”、讨论“中国”，这既是学术研究内在理路的自然延伸，也是基于现实情境而生发的独特现象。从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来看，“中国”作为一种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因其平常而习焉不察，导致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认识不清乃至有所偏差，由此产生了对概念进行甄别和辨析的需要。不能明晰历史上的“中国”，也就无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族群和族群政权等问题。从现实情境的角度

来看，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现实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愈来愈重要，世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而欲理解现实之“中国”，就必须了解历史之“中国”。在国际学者关于“中国”的讨论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采用“国家转型”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回答了“现代中国”从何而来这一关键议题。该书从现代国家形成的四个基本要素——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入手，以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角度层层剖析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着力分析了国家重建过程中的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从而论证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

以往学界关于现代中国形成的研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取向。一是宏大叙事的视角，偏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或是长时段的结构性质议题；再有一种是边缘人、边缘群体、边缘现象成为历史学家关注和探究的对象。不过，边缘化叙事又易陷入“碎片化”的泥潭之中。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理路来看，宏大叙事与“碎片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过多注重宏大叙事，或陷入史学的“碎片化”，皆不足取。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即有碎片化的特征，它决定了史学研究只能从碎片入手，但“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碎片之中也可反映出整体。此中之关键，在于应当如何转变视角，怎样“管中窥豹”而不至于“盲人摸象”。

从这一角度而言，《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超越了以往的两极叙事，在现代中国形成史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范式。具体而言，它将现代

中国的形成史定义为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于是乎“国家转型”就成为作者念兹在兹的中心议题。以此一问题和视角作为引领，该书实现了三点突破。在结构上，打破了以往通史与专门史的藩篱，以大历史统摄全篇；在时间上，跨越了从晚明到人民共和国成立3个多世纪的时段，做到了走出断代、贯通古今；在视角上，始终以外中两个参照系作为对比，在相互对照中发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以上三个方面在该书中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可以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谓的“大历史”与其他学者的“大历史”“长时段”，显得还是有些“短”。它既不像许宏那样的考古学家把时间回溯到四五千年前，又不像葛兆光、许倬云等人纵横论断数千年的文明史，而只把研究时段限定在1600—1949年。这不仅把握住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衔接点，而且还紧扣“现代中国的形成”这一研究主题。这一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历史中国”开始走出传统的国家建构模式，逐步向“现实中国”过渡和转轨。抓住了这一点，就等于掌握了解读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一把钥匙。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达到完美。该书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过于宽广，其中每一个具体议题的研究又已有相当数量的成果涌现。这样一来，既使得作者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导致因成果太多而无力遍及，难免出现纰漏和瑕疵。

以第二章为例。在讨论清朝治理内地各省的举措时，作者在“合法性的考量”部分大量引用商鸿逵、何炳棣、郭成康等人的成果，却很少回

应“新清史”关于清朝是否“汉化”的讨论。作者认为清朝以前的原初型中国是一个单一族群国家，后来通过军事征讨和行政整合，再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在此作者明显忽视了此前传统羁縻制以及“因俗而治”的延续性，与史实相违背。

不妨再就边陲问题作一讨论。清朝将边陲作为帝国藩屏的举措，虽然在管理模式上有所创新，但由于边陲只是政治同盟，因而统治者极力避免边陲族群与内地汉人相互交流，造成边陲民众缺乏“中国”认同，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分离意识。“疆域国家”的构建，恰恰导致统治者不具备成熟的主权国家等意识，在侵略者面前无法有效捍卫主权领土范围，继而造成列强进一步的侵略与扩张。塞防与海防的讨论更显示出“疆域国家”的巨大隐患。而拥有主权意识恰恰是现代国家所必需的要素之一。尽管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存在着诸多弊端，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仍然无法找到能够超越并且优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模式。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试图从国家转型的角度，论述“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应该说，作者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高超的叙事能力，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为何作者痴迷于追寻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这一议题？一种新的解读方式的出现，既是学术发展推动的结果，也与现实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运用历史事实来论证现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根植于中国历史的实际，更具有历史的说服力和特殊性。

# 美和悲悯升华了生命

束红马



这是一部印制精美的摄影诗集《生命的功课》。诗集中的《写诗的意义》可看作诗人杨珊关于诗的宣言：“写诗的意义不是成为诗人而是/让血脉的雪液流淌在人类的身躯/诗纯洁/如雪”。

就如她在诗集的自序中说的，“无论是云朵、雨滴，还是微风，都能与记忆链接，化成某种意象以洗心涤虑”，古今中外，艺术家们的心灵和大自然都有一种深刻的共鸣。所以，现代主义艺术的鼻祖爱伦·坡才说，艺术就是“透过灵魂面纱在自然中观察到的意义”。浪漫主义诗人把大自然和诗融合，在融合中发现美，创造美，不仅沉淀为诗学，也渗透进生活、情感和思想。

那一次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雾灵山采风活动，虽然没有跟随团队登临这座山，但读了杨珊的诗《自由》，却感觉到了雾灵山，不仅仅是自然的山，更是心灵的山。“给小草自由给大树自由/给岩石自由 给溪流自由/雾灵山做到了……也让风自由也让雨自由/也让岚自由 也让天自由/雾灵山做到了”。诗人用自己的情感和生命的精神把雾灵山心灵化了，所以诗性的雾灵山提升了大自然的雾灵山，雾灵山不仅仅是生长树木和花

草的山，也是生长美的山。大自然属于美，诗也属于美。所以，法国著名诗学家马利坦这样说，“美是诗的必然的关联物和超越一切的目的目的”。我在杨珊这部诗集中发现，诸多作品都是在大自然中发现生命的美，创造生命的美。她在“荒地”看到的不仅仅是“杂草丛生/野卉滋长”，而用心灵看到是“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荒地》）。她在“花草之间/山水之间”，用心体会会到的是“无处不在”的“韵律”。她在“早春里”，听到的是“一首恋歌”，“从湖畔穿过”，“径直向人间”（《路过早春》）。“一朵花香了一个阳台”，“那朵叫做蜻蜓的花/曾经照亮过她的笑容”（《阳台上有一只蜻蜓》）。甚至她“想在耳朵上种花”，以使“听觉的领土不再荒芜”（《耳朵上的花田》）。

杨珊认为，“爱与悲悯是艺术创作的底色”。爱，其实就是悲悯。据说，有人问弘一法师爱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爱，就是慈悲。”这是大师基于佛学对爱的理解，也是极富情感力量的回答。

杨珊的这部诗集，洋溢着诗性的悲悯力量。《写给小枣》是献给自己在犬类收容所领养的小狗的诗。诗人认为自己与小枣有“不解的缘分”，而想起那两只被坏人伤害的小狗，则感到与小枣是“再续前缘”。“你最美淑的样子——/枕着我的鞋子如梦，枕着诗和远方”。《刺猬之死》一诗描写了因为修路而令“一家三口”惨死的过程：“路南是垃圾场 路北是荒野/生活在路北的刺猬需要去路南觅食/求生之道亦是地狱之门//每天刺猬横尸不断/最后三只陆续惨死后/这条路再也没有见到过刺猬//那三只也许是一家三口……”。悲悯不是喊叫出来的，而是通过诗性的构思，在叙述中表达出来的。

精神的生命会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境界。而杨珊诗集中表达的诗性的美、诗性的悲悯，则升华了精神生命的存在。

# 《音乐之恨》：让哲思潜入寂静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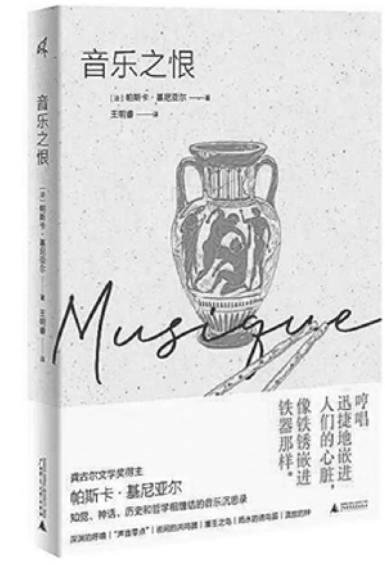
杨 道

在《音乐之恨》的首页，有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诗：音乐在忧愁上洒下了几滴遗忘的祭酒。忧愁之于沉淀着回忆的灵魂，正如渣滓之于盛着酒水的酒壶。

这样的开篇于我而言，充满了诱惑，如同该书作者所说，我们用布匹包裹着一种声音的裸露，它来自婴儿时期，伤势严重，无声无息地待在我们体内深处。这些布匹有大合唱、奏鸣曲、诗歌。

我们的身体里一直存有声响，这使得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歌者、鸣者和说者。但我们自己的耳朵听不到这些古老的声音和呻吟。

《音乐之恨》似乎就是我所提到的那匹布。它是法国著名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的散文作品集，一部知觉、神话、历史和哲学相缠绕的音乐沉思录。它论述了听觉的本质，作者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开始追溯，音乐何以成为痛苦和死亡的起源。作者解读了音乐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提出了对音乐的反思：音乐在何种程度上会变成痛苦？他试图探究音乐与恐惧、音乐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音乐“高雅”的固有印象，让读者看到那些喜欢最精致又最复杂的音乐，能够一边听音乐流泪的人，也拥有不善的一面。在论述中，作者对音乐的“仇恨”似乎合情合理，而人类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值得审视。

基尼亚尔对哲学、历史、艺术有深入的研究。他于1966年开始创作，著有大量小说、评论和随笔。他来自音乐世家和语言学世家，使用文字书写音乐似乎是他命中注定的事情。他创作于1991年的小说《世间的每一个清晨》被改编成经典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在世界影坛引起很大的关注。

他的其他作品也极富个人特色，和《音乐之恨》一样，都充满着极具节奏感的律律。是什么让悲伤在日出时终结？是音乐。这是基尼亚尔的回答。而音乐，也是《音乐之恨》译者王明睿所能找到的正确打开基尼亚尔的方式。无论是塞王之歌还是俄耳甫斯之琴，抑或是伯牙学艺以及成连入海，音乐都是基尼亚尔连通神话和现实、过去和当下、自我和世间万物的纽带。

《音乐之恨》为基尼亚尔研究专家的国内首译。它延续了作者早前的作品《世间的每一个清晨》及《罗马阳台》的艺术之旅，书写黑暗与孤独永恒主题。书中的表述充满哲思，断章式的写作和鲜明的意象群，如同深渊的声声呼

唤，清晰而深具悬念感。于小说读者和音乐听众而言，在阅读此书过程中，俗世是他们用来放置双脚的地面，是寂静的制造者。而音乐让人们闭上嘴和眼，潜入寂静之海。

出生在1948年的基尼亚尔是法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异数，有评论说他“一个最谦逊同时也是最傲慢的作家”。基尼亚尔小时候患有自闭症，长大后，他常常离群索居。他喜欢蒙田的随笔作品和《一千零一夜》的传奇。他擅长用另类的叙事还原古典情怀，用经典和记忆连通历史和当下，拂去岁月的尘埃，他的文字总有隐隐的、古老智慧温润的光泽。

我跟随基尼亚尔在他音乐一样的文字里游牧。这其实是一条储有多元文化的历史长河，河里漂着不可见物和文字、古人的影子、寂静、隐秘生活、无用艺术、个性与爱情、时光与乐趣、自由与欢乐，等等。而我站在河岸边，在六月一些泛黄的树叶间、颤动的光线里，听基尼亚尔压低嗓音从树林间传递过来的悄悄话：寂静之于耳朵正如夜晚之于眼睛。

# 新书速递



## 《乱世人心：从晚唐到五代》

王宏杰 著

该书重点聚焦唐末黄巢起义到五代初期梁唐易代之间近四十年的历史，作者选取了这个动荡时代中非常有特色的历史人物独立成篇，书写的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僧侣、走卒商販、盗匪无赖、流民等各色人物。全书充满杀戮、背叛、欺骗、权谋等血腥又阴沉的底色之下，也不乏温情与浪漫的事件。

## 《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

（日）坂本龙一 著

本书是享誉世界的音乐家坂本龙一最后的自传，在这本真挚感人的书中，他讲述了自己与癌症共存的近十几年的个人生活。这是一本传记，也是一本夹杂着真实情感和私密内容的生命手记，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进行阅读，去抚慰心中对坂本龙一先生的怀念，也去唤起心底那份于庸常生活下对满月之姿的向往。



## 《中国茶图鉴》

李 韬 著

零基础茶道家茶艺入门，300余种茶叶图鉴速查，一本书让你读懂中国茶。本书收录的中国茶和世界常见名茶，都是经作者李韬亲自筛选并品鉴记录。李韬20余年茶圈浸淫，曾主持过上百次茶会，在书中他将自己品尝过的茶滋味记录无保留地分享给读者。



# “八公山”文艺评论（第八季）征文

学书法的人都听说过颜真卿，都知道“颜体”。其碑帖《多宝塔》作为初学楷书的爱者临习绕不过的范本。但颜真卿的身世、为人、为官、处事却很少有人提及。

## 颜真卿其人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生于公元709年，卒于785年，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只不过颜真卿巅峰的书法艺术成就掩盖了其在政治、军事上的光华，所以世人只知其是杰出的书法家。颜真卿的远祖为孔子的高徒，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论语》的编撰者之一颜回；六世祖为北齐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著有影响深远的《颜氏家训》；曾祖颜勤礼及其兄颜师古均是唐初的政治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历史学家，毫不夸张地说颜真卿乃圣

## 颜真卿其事

纵观颜真卿一生的光辉业绩，可用能战、能谏、能爱、能书概括。颜真卿能战。未雨绸缪，历战河北，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

基，晚年极其昏庸懒政，白居易《长恨歌》开篇写到：“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贵妃被“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任命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与安禄山相互争宠，争权夺利，矛盾日益加剧，最终引发安史之乱，大唐王朝由盛转衰。杨国忠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嫉贤妒能、残害忠良，专权误国，败坏朝纲。一身正气的颜真卿自然不被杨国忠所容，结果被贬到平原郡（今山东德州）当太守，这也是世人称之为“颜平原”的缘由。然而，正是在平原郡太守任上，成就了颜真卿一生的英名和伟业。颜真卿受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节制，到任平原郡太守后不久，颜真卿敏锐地察觉到安禄山有反叛迹象，他表面上纵情于饮酒作诗，迷惑安禄山，私下里秘密招募勇士、储备粮食，以防不测，在平原郡修葺城墙，挖深挖宽护城河。有人向安禄山告发，安禄山认为颜真卿乃一介书生，没把他放在眼里。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十一月，安禄山引兵南下，河朔陷落，年底攻

陷东都洛阳，直逼长安。正在都城长安骊山脚下华清宫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唐玄宗听到安禄山造反，起初不相信，到后来得到河北各州郡望风而逃的报告时不得不信，唐玄宗环顾左右哀叹说：“河北二十四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恰在这时，颜真卿的信使李平到了，报告了安禄山反叛和平原郡苦苦坚守待援的消息。唐玄宗感叹，我不认识颜真卿，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个忠臣。面对安禄山的虎狼之师，颜真卿首举义旗，联络其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共同抗击叛军，颜真卿奋勇杀敌，各地纷纷响应，被河北十七郡推为盟主，联盟拥有义兵20万，拦腰截断了燕赵，阻止了叛军急攻潼关，有效地牵制了叛军的后方，为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朝廷大军平定安史之乱奠定了基础。为维护大唐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叛军的战斗中，颜真卿镇守的常山郡失守，一家30余人被叛军杀害，颜真卿的儿子颜季明被叛军凌迟处死，满门忠烈。颜真卿闻讯，满腔悲愤，情不自禁，一气呵成写下了“祭侄文稿”，史称为天下第二行书。